



英美校園霸凌防制政策：教育法之觀點

林斌*

摘要

近年來先進國家已將中小學校園霸凌之防制，視為重要教育政策議題。但我國校園霸凌之相關研究，主要集中於霸凌行為成因、教職員責任及學校處理霸凌事件之程序，相對忽略校園霸凌防制早已超越學校管理層級。事實上，政府防制校園霸凌不僅需要強化學校教育人員的專業能力，更應重視利害關係人義務及外部機構參與等層面之政策建構。而英、美兩國自廿世紀九〇年代初期起，即大力推動學校教育改革，強調校園安全與學習品質之重要，並視校園霸凌防制為中小學校園安全政策之優先內涵，其正向發展經驗值得我國借鏡。因此，本研究擬採用歷史比較法，透過教育法之觀點，針對英、美中小學防制校園霸凌政策之內涵進行分析，以供我國政府部門未來修正相關政策之參考。本研究之結論顯示：英、美校園霸凌防制政策需遵守行政法之原則，能夠回應校園安全之需求，重視對家長之課責，對學生及教師之基本人權亦能予以保障。

關鍵詞：校園霸凌、教育法、學校安全

* 林斌，國立臺南大學教育學系助理教授（通訊作者）
電子郵件：horace@mail.nutn.edu.tw
投稿日期：2013年6月17日；修正日期：2013年8月22日；接受日期：2014年1月6日

School Anti-bullying Policies in the UK and USA: A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 Law

Bin Lin*

Abstract

Anti-bullying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has been a vital issue in education policies of developed countries for years. The related researches in Taiwan were mainly focus on the causes of bullying behavior, the obligation of school faculty, and the procedures of dealing with it, comparatively ignoring the fact that school bullying has surpassed the level of school management. To tackle with it, the government should not only strengthen the profession of the school faculty, but also emphasize on the obligation of stakeholders and the involvement of external agencies. From 1990s, the UK and USA have been keen on school education reforms, highlighting the importance of campus safety and learning quality by prioritizing anti-bullying in campus safety policies; their positive experience is worthy for reference. Therefore, this study adopted the historical comparative method to analyse the components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anti-bullying policies in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 law for the information of modifying related policies in the future. The results suggest the British and American anti-bullying policies follow the principles of administrative law, echo to the call of campus safety, highlight the accountability of parents, and safeguard the human rights of pupils and teachers. Accordingly, implications for related policies adjustments in Taiwan are proposed.

Keywords: school bullying, education law, campus safety

* Bin Lin,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ainan
E-mail: horace@mail.nutn.edu.tw (Corresponding Author)
Manuscript received: Jun. 17, 2013; Revised: Aug. 22, 2013; Accepted: Jan. 6, 2014

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霸凌行為之研究，早自一九七〇年代起即在歐美各國逐漸受到重視，特別是近年來先進國家相關研究發展重心，已明顯聚焦於中小學之校園霸凌行為防制（Jimerson, Swearer, & Espelage, 2010）。而欲有效處理校園霸凌行為，除強化學校教育人員的專業能力及課責外，利害關係人義務、管教措施及校外機構參與等之政策建構亦不可或缺。惟我國類似主題之研究有限，僅少數研究（林斌，2006；陳利銘、鄭英耀、黃正鵠，2010；黃德祥、黃麗萍，2009）觸及國內外相關政策制度之比較探討，相對缺乏法制性之分析與政策建議。

而我國在學制及相關教改政策上一向深受英、美兩國影響（江愛華、高家彬，2011；沈姍姍，1995）。同時，美國自1999年發生科羅拉多州傑佛遜郡的哥倫拜高中槍擊案後（Columbine High School shooting），各州反霸凌立法即開始快速增加，至2012年底已有49州通過防制校園霸凌之法律（Stuart-Cassel, Bell, & Springer, 2011;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 Human Services [HHS], 2012a）。而英國艾爾頓報告（The Elton Report, 1989）公布後，揭露有近20%之學生於在校期間遭到霸凌，亦引起英國政府及社會大眾之重視，來自教育專業人員及媒體的批判，使英國教育部設置推動第一個大規模的反霸凌方案（1991-1994）（Office of the Children's Commissioner, 2006）。因此，關切校園霸凌危害學生身心之社會壓力，促使英、美兩國政府積極回應，將防制校園霸凌列入學校安全政策之優先順位（Blandford, 1998; Imber & Van Geel, 2010），且英、美兩國亦為世界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成員中，少數已針對不同型態霸凌行為立法予以規範之會員國（Moore, Jones, & Broadbent, 2008），各類反霸凌法令及管教措施日益充實，其發展經驗應有足資借鏡之處。故針對英、美兩國校園霸凌防制政策之內涵進行探討，提供我國相關法制修正之參考，應有其適切性。

二、研究問題

從公共政策之意涵而言，政府部門推動之校園霸凌防制政策，係政府機關設計處理此一公共問題之決策過程及行動方針（Stewart, Hedge, & Lester, 2008），其內涵包含法令、行政指導、行政計畫及各類公共服務等政府活動（吳定，1998；Starling, 2011）。

同時，從法治國家依法行政原則之觀點而言，政府部門在政策推動過程中，除追求政策目標達成外，仍應兼顧基本人權保障及對政府權力之限制（Rosenbloom & Kravchuk, 2002）。

而自國民教育權理論之觀點探討，國民有要求國家提供教育機會之權利，而國家為保障國民教育基本權之實現，即應透過法律制訂與執行之形式，履行法治國家保障人民權益之任務（李惠宗，2004；許育典，2007）。因此，政府部門對防制校園霸凌政策之推動，亦可視為在特定環境系絡中相關教育法之制訂與施行，¹ 其不僅著眼於校園安全，更是維護學生教育基本權的具體作為。故本文擬透過教育法之觀點，針對下列問題進行探討分析：

- （一）英、美國民中、小學校園霸凌防制政策之法理原則為何？
- （二）英、美國民中、小學校園霸凌防制政策之內涵有何特色？
- （三）英、美國民中、小學校園霸凌防制政策之具體成效為何？

三、文獻檢視

（一）校園霸凌行為之界定與影響

校園霸凌行為之定義長期以來並未一致，通常係指在校園中，一個人或一群人對他人的欺凌現象（Jacobsen & Bauman, 2007），而依知

¹ 自人民為教育權主體暨保障人民學習及受教育權利（我國教育基本法第 1 條、第 2 條第 1 項參照）之立場著眼，教育法係包含憲法保障教育基本權、教育行政法（含行政命令、慣例）及法院判例之規範體系，舉凡涉及教育基本權之法制規範，均為教育法探討範疇（李惠宗，2004；周志宏、徐筱菁、薛曉華、蔡志偉，2008）。

名研究霸凌之挪威學者 Olweus (1993, 2010) 的定義，校園霸凌係指「一個學生長期重複地處於一個或多個學生的負面行為中」，此一界定強調之特徵在於：霸凌為有意且長期之負面或侵犯行為 (negative or aggressive acts)，亦與學生之間的權力失衡 (imbalance of power) 有關。英國教育部則將霸凌界定為²：個人或群體重複長期地故意傷害其他個人或群體生理或心理之行為，其可能以多種型態 (例如網路霸凌) 進行，亦常肇因於對特定群體之歧視偏見 (例如種族、宗教、性傾向等)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2011: 3)；至於美國聯邦衛生與公眾服務部 (HHS) 係將校園霸凌定義為：存在於學生間之有害性侵犯行為，涉及真實或認知的權力失衡，且此一行為係長期重複發生 (或有可能重複發生) (HHS, 2012b)。因此，綜合而言，校園霸凌行為係與學生間之權力失衡或特定歧視密切相關，且有針對同一受害者不斷發生的特性。

此外，透過不同領域專家學者之多年研究，現已證明霸凌行為與當事人許多長期性負面後果具有密切相關，包括藥物濫用、精神沮喪、攻擊性衝動、自殺、逃學及少年犯罪等 (Gastic, 2008; Klomek, Marracco, Kleinman, Schonfeld, & Gould, 2007; O'Brennan, Bradshaw, & Sawyer, 2009; Rivers, Poteat, Noret, & Ashurst, 2009; Roland, 2002)，因此，早期介入處理校園霸凌事件十分重要。

(二) 校園霸凌行為之類型

中小學校園霸凌行為之類型並非一成不變，過去曾將校園霸凌分為肢體霸凌、言語霸凌、關係霸凌等三種形式 (Jacobsen & Bauman, 2007)，但隨著社會發展及資訊科技日新月異，校園霸凌類型亦日趨多元，依 Olweus (1993, 1999) 之分類，校園霸凌共可分成言語霸凌、經由人際關係排斥孤立而霸凌、身體霸凌、經由謠言、謊言而霸凌、勒索

² 英國包含英格蘭、威爾斯、蘇格蘭及北愛爾蘭四大區域，其中英格蘭 (England) 人口約佔全英 83.86%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2012)，故本文有關英國校園霸凌防制政策之探討標的，係以適用英格蘭地區之公立中小學及相關統計資料為準。

及毀損物品之霸凌、威脅及強迫霸凌、種族霸凌、性別霸凌及網路霸凌等九種型態。而以霸凌行為傷害之標的予以區隔，其類型可分為以下兩大類（Sullivan, 2011）：

1. 肢體霸凌（physical bullying）：包含撞、踢、捏、推、抓、用拳猛擊、拉頭髮、反鎖房間、吐口水及其他對身體的攻擊。
2. 心理霸凌（psychological bullying），又可分為以下兩類：
 - (1) 言語霸凌（verbal bullying）：包括辱罵電話、勒索金錢、使用性暗示語言、惡毒評論、中傷（name-calling）、匿名傳送帶有病毒信件訊息、惡意戲弄、散布不利謠言等。
 - (2) 非言語霸凌：包含操作破壞人際關係、用詞粗魯、忽視或孤立受害者（此亦稱為關係霸凌）。

此外，近年來透過電子郵件、網路及簡訊等科技途徑進行惡意騷擾之「網路霸凌」（cyber-bullying），在數量上已快速增加，此種新興型態之「心理霸凌」，雖不會直接造成肢體傷害，但因網路傳播能力無遠弗屆，對受凌者的影響不能小覷。

（三）校園霸凌者之家庭關係

檢視各國有關霸凌者家庭關係之研究結果，可以發現校園霸凌者的家庭關係普遍存在的特徵，包括低凝聚力、缺少父親、高衝突家庭環境、父母態度冷漠、高度權力需求、許可或鼓勵侵犯行為、家庭功能不足、權威式教養、無視子女感受及粗暴體罰等（Olweus, 1997; Pontzer, 2010）；整體而言，愈是遭到父母虐待的兒童，成為校園霸凌者或受凌者的風險就愈高（Duncan, 2011）。所以，欲有效預防及處理校園霸凌事件，必須建立介入霸凌者家庭關係的合法途徑與授權，因為，學校教育人員需要法定機制及政策工具的協助，才能促使家庭共同負起改善學生在校行為之責任，調整傳統上學校與家庭對學生行為的分工界限，進而有效處理學生各類偏差行為（林斌，2013；Blandford, 1998）。

四、分析架構

校園霸凌事件當事人係以霸凌者、受凌者及學校教職員為主，並與主管行政機關、學生家長（監護人）及校外機構等成員，形成校園霸凌之政策利害關係人網絡。本研究即採用此一「政策利害關係人網絡」之概念架構（如圖 1），以英、美公立中小學場域為探討核心，透過教育法之觀點，運用歷史比較法針對各類法規及政府活動之文獻，³ 進行系統性之比較分析，以深入瞭解英、美校園霸凌防制政策之內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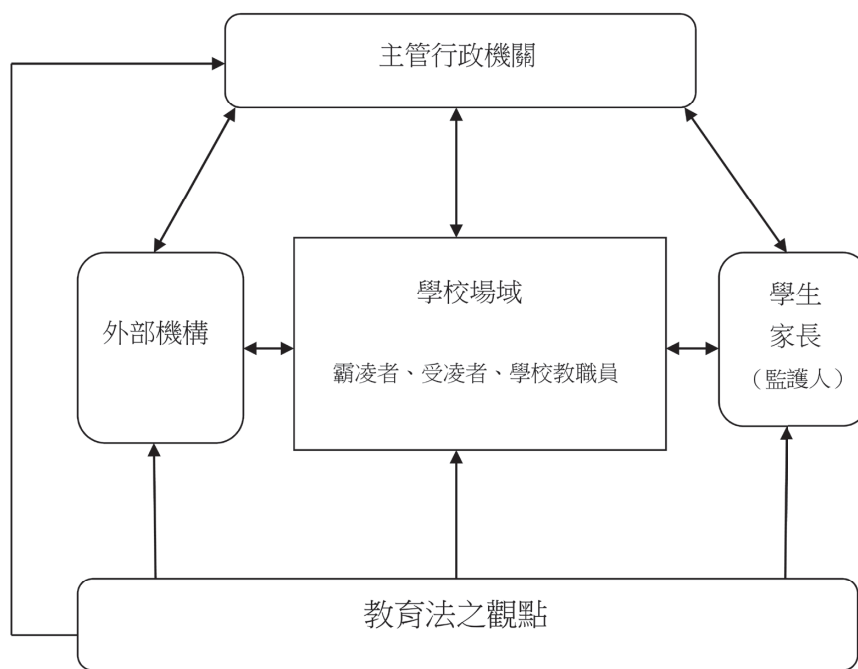


圖 1 本研究分析架構：校園霸凌防制政策利害關係人網絡

³ 歷史比較法（historical-comparative research）係運用各種文獻進行分析，並著重於在眾多與研究問題相關之資料中發現模式或是運用特別的理论範型進行分析（Babbie, 2012）。

貳、校園霸凌防制之法理基礎

一、英、美人權保障法制之特色

傳統上，英美法系雖有重視國會立法的歷史發展，亦有權利法案（*Bill of Rights*）等憲法位階的人權保障規範，但主要係以不成文的普通法（*Common Law*）為基礎，透過法院判例累積來落實對基本人權之保障，同時，行政部門並不擁有獨立的行政命令訂定權，而需有法律依據或授權；此種由司法部門裁判以維護實質正義的法治（*rule of law*）概念，與作為大陸法系發展典型之德國，透過以國會成文制定法（*statutes*）保障人權，繼而發展出成為「法治國」（*Rechtsstaat*）重要基石的「法律保留原則」相較之下，⁴兩者對維護人權的主旨雖趨一致，但在國家機關權力的拘束模式上明顯有所差異（陳淳文，2012；黃舒芃，2004）。惟在全球化發展趨勢下，各國在政治、經濟及文化上之依存性與趨同性日益增長，加以國際人權法內國適用之普及，英美法系與大陸法系的實體內涵，業已相互採納融合（王澤鑑，2010；謝哲勝，2002）。因此，不僅美國早已引進罪刑法定原則，由聯邦國會及州議會制定成文法處罰犯罪行為，使刑事法中的普通法重要性逐漸式微（*Jeffries, 1985*），英國於1998年亦通過《人權法》（*Human Rights Act*），將《歐洲人權公約》（*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國內法化，並透過司法判決賦予該公約高於一般制定法之規範位階（張文貞，2007；*Haselgrove-Spurin, 2004*）。所以，包括比例原則、法律明確性原則、法律保留原則等大陸法系中行政法之重要原則，雖未能在英、美兩國發展出精確對應之具體建構，但業已在兩國諸多法制領域建立，特別對人權法領域及司

⁴ 法律保留原則又稱為積極依法行政原則，係指在無法律授權時，行政機關即不能合法作成行政行為，因憲法已將特定事項保留予立法機關，須由立法機關以法律予以規定，亦即行政行為不僅不得抵觸法律，更需有法律明文依據，始能合法干涉人民自由與權利。而行政作為對人民自由與權利之干涉措施並不以法律之直接依據為限，亦得基於法規命令為之，但法規命令須有法律之授權，且法律對該授權之內容、目的及範圍應明確予以規定（吳庚，2003；許宗力，2006）。

法審查 (judicial review) 之標準，產生相當程度之實質作用，⁵ 而與人權法關係密切之教育法體系自也受到相關影響。

二、英、美學校對學生管教權力之發展

英、美兩國學校對學生進行管教作為的合法權威，長期以來主要係建立在學校教師具有「代位父母」(in loco parentis) 的普通法原則上，因此，當學生在校上課時，可視為父母將此一時段對子女之教育權委託於學校及教師，而學校教職員即可在合理範圍內代位行使管教權懲戒學生 (Townley & Schmieder-Ramirez, 2010)。⁶ 但近年來有越來越多父母或監護人 (以下簡稱家長) 透過司法訴訟挑戰此一原則，不願再釋出管教權力。所以，英、美兩國均積極透過制定法律建立學校教職員管教權力之依據，以減少學校管教爭議 (Department for Children, Schools and Families, 2009)。同時，英、美兩國之教育法令及司法判決，通常會給予學校教職員較大之裁量權，以因應學校教育活動中的實際狀況。以美國聯邦上訴法院為例，其即透過判決表示：州及學校行政主管需要擁有廣泛管理權，以規範及管理校園中之師生行為。⁷

三、校園霸凌與其他違法行為之區別

(一) 英國

在英國現行法律中，霸凌行為並非特定刑事罪名，但是，部分具

⁵ 以英國上議院 2004 年對《反恐、犯罪及安全法》(Anti-terrorism, Crime and Security Act 2001) 之審查為例，其判決認定，該法中允許不經審判而無限期拘押恐怖活動嫌犯之規定，違反歐洲人權公約，不符比例原則 (參見 A and others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2004] UKHL 56)。

⁶ 以美國加州為例，此一普通法原則現已納入其制定法中，但排除體罰之適用 (參見 California Education Code 44807)。

⁷ 參見 Boucher v. Sch. Bd., 134F. 3d 821,827 (7th Cir. 1998)。

有騷擾及威脅性的霸凌行為，可能被認定為犯罪行為（依 Protection from Harassment Act 1997 & Public Order Act 1986）。同時，霸凌行為實質上可視為過失罪（negligence）的形式之一，因其會造成受害者的身心痛苦甚至引發自殺。所以，英國地方教育當局（Local Education Authorities, LEA）及學校，對校園霸凌等學生偏差行為導致之後果負有法律責任，法院判決也支持針對被視為犯罪之校園霸凌者（12 歲至 17 歲）發出「拘留教導令」（detention training order）予以強制教育訓練，時間為 4 個月至 2 年（Ford, Hughes, & May, 2010）。此外，校園霸凌行為亦可能因其動機、方式及後果，觸犯下列法令（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2012a）：

1. 《惡意通訊法》（Malicious Communications Act 1998）：此一法律針對下流、侮辱及威脅的電話或信件恐嚇行為，明定得視為犯罪行為。
2. 《平等法》（Equality Act 2010）：此法取代先前各類反歧視法（anti-discrimination laws），簡化原有各種平等法令（如年齡、性別、殘疾和其他歧視）並以單一法律統合。其要求公共部門設定平等目標並至少每四年一次檢討公布。每一公共部門需有各自平等目標，並致力消除不合法歧視、侵害及其它《平等法》禁止之行為。而各類受保護之特質包含：年齡、殘疾、變性、懷孕、種族、宗教信仰、性別及性取向等。

（二）美國

目前美國聯邦政府層級並無針對霸凌防制訂定專法，但若霸凌行為與涉及種族、性別、宗教之歧視偏見有關，則學校得依聯邦相關公民權利之法令予以處理。此一政策主要係由美國聯邦教育部民權事務辦公室（Office for Civil Rights, OCR）負責執行各項聯邦法律，以確保接受聯邦財務補助之教育機構，不會出現以下法律禁止之歧視性行為：

1. 民權法案（Civil Rights Act of 1964）第六章（禁止種族、膚色與國籍歧視）。
2. 教育修正案（Education Amendments of 1972）第九章（禁止性別歧視）。
3. 康復法案（Rehabilitation Act of 1973）第 504 節（禁止殘障歧視）。
4. 年齡歧視法案（Age Discrimination Act of 1975）（禁止年齡歧視）。
5. 美國殘障人士法案（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of 1990）第二章（禁止歧視殘障人士）。

至於其他性質霸凌事件主要依據各州制定之法令規範，不過，如果霸凌者年齡超過 12 歲，且行為符合犯罪要件，其霸凌行為可能成立刑事罪（Essex, 2012: 106）。

（三）非霸凌行為

由於部分霸凌行為易與其他犯罪行為混淆，有必要予以明確區隔，以利對學生偏差行為之輔導管教。而在英、美兩國校園中，通常以下行為並不被視為校園霸凌（Sullivan, 2011）：

1. 刑事犯罪行為（criminal behavior）：霸凌是反社會的傷害行為，但不是刑事犯罪行為，例如下列行為已不屬學校管轄之範疇：
 - (1) 以武器或其他物品嚴重攻擊。
 - (2) 明顯偷竊。
 - (3) 嚴重威脅傷害身體或殺害。
 - (4) 性侵害。
2. 次霸凌（sub-bullying）行為：激烈遊戲、粗野翻滾或是相互戲謔中傷（在平等情境中），如果這些行為並未重覆或導致傷害，則應視為次霸凌行為，並從頻率及擴散狀況予以監控。

參、校園霸凌防制政策之比較分析

一、立法規範模式

英國國會在 1993 年教育法案（1993 Education Act）中，首次明訂學校處理學生偏差行為的政策架構，授權英國教育部訂定行政命令，以規範指導地方政府及學校建立有效的學生偏差行為處理機制（Blandford, 1998）。此外，依據英國《學校標準架構法》（Schools Standards and Framework Act [SSFA], 1998）第 61 條之規定，學校訂定學生行為管政策，必須明確並定期宣導。尤其應注意懲罰的一致性、公平性以及對優良行為的獎勵聯結系統。因此，英國處理學生校園霸凌等偏差行為之法制規範，係以中央層級之國會立法，作為 LEA 及學校訂定管教規章之法源，確立學校教職員管教學生之權力，並具體授權學校訂定相關懲戒措施內涵及執程序（林斌，2013）。

而美國聯邦政府雖未針對校園霸凌訂定專法，但是，聯邦教育部於 2001 年《安全無毒學校及社區法》（Safe and Drug-Free Schools and Communities Act）生效後，於 2002 年設置「安全及無毒校園辦公室」（Office of Safe and Drug-Free Schools, OSDFS），主掌中小學暴力、毒品防制及學生品德教育等事務之推動及補助。所以，除 OCR 外，OSDFS 工作項目亦涵蓋校園霸凌事件，透過專案經費提供受害學生輔導及品格教育補助款。至於地方學區所屬中小學通常係依聯邦、州政府法令及學區之政策或學生行為準則（Code of Student Conduct, CSC），執行反霸凌之預防宣導、輔導諮商及懲戒措施（Thomas, Cambron-McCabe, & McCarthy, 2009），因此，學校教職員在執行校園霸凌防制政策時，亦能擁有實施管教措施之完整授權。

所以，英、美兩國中央政府體制雖不相同（前者為單一國內閣制，後者為聯邦國總統制），但是，在校園霸凌防制政策上，均有對應性之

立法及對地方政府之行政指導（administrative guidance）或經費補助，⁸而學校均為政策執行之主要場域，故在法令中明定學校教職員具有處理學生偏差行為（包含校園霸凌）之管教權責，亦為兩國校園霸凌防制立法的特色。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英、美兩國法令對校園霸凌之定義、類型與處理機制之設定，並未完全依循學術研究之結果，似乎反映出政策設計往往需以當事人權益保障及資源配置之可行性為優先考量。⁹

二、零容忍政策（zero tolerance policy）

所謂「零容忍政策」係指針對特定違反法令行為，施以事先明訂之懲罰措施，且不論犯行輕重，只要違反規定一律嚴格懲處（Conn, 2004: 175-176）。此一用語係起源於 1986 年，美國聯邦檢察官率先在一項政府扣押運毒輪船方案計劃中使用，並自 1990 年代起快速應用在防制非法入侵、種族歧視及性騷擾等政策中（Skiba & Peterson, 1999）。此一政策在公立學校而言，意味著對違反學生行為準則（CSC）之學生，特別是針對持有槍械或毒品者，採取快速停學或開除之懲戒處分，以免危害其他學生及教職員（Rosen, 2005）。其中尤以美國聯邦《無槍校園法》（Gun Free Schools Act）（1994 年通過）為推動零容忍政策之關鍵立

⁸ 以英國教育部為例，其訂定之學校處理學生偏差行為（含校園霸凌）相關規範，除依個別法律授權訂定之法規命令外，絕大多數內容係以協助學校歸納相關法律適用重點、提示學校法令修正事項及給予問答式建議為主，並以 guidance 形式發布，其性質與我國之行政指導（administrative guidance）概念近似。

⁹ 霸凌防制政策在程序及實質上均需力求明確可行，學校教職員方能有效落實，以維護學生身心安全。惟學者間對各類校園霸凌行為定義及特徵之見解並未一致，完全列舉所有霸凌行為類型及構成要件亦無可能，法律有必要賦予行政機關及學校裁量權以因應個案狀況；加以英、美中小學及地方政府教育資源水準不一，又需兼顧反歧視及種族平等議題，亦不宜在法律中齊一規範提供相關公共服務之標準（例如諮商、醫療等）。所以，為使學校教職員能適法有效處理校園霸凌案件，減少爭議；相關法令之內涵自難完全依據學術研究之結果執行，而需以保護當事人權益及資源配置可行性為優先考量（Sacco, Silbaugh, Corredor, Casey, & Doherty, 2012）。

法，其要求各州立法針對攜帶槍枝到校學生處以至少退學一年之懲戒處分，繼而各州又在州法律中擴張零容忍政策之範圍，包含校園霸凌、藥物濫用、暴力鬥毆、干擾教學等事項，均可能遭到定期停學或退學處分。而英國中央政府也多次在行政指導中強調「校園霸凌」絕不能被容忍，並要求學校校長及教師需以確保學生人身安全，為學校管理最優先要務；在此目標下，防制校園肢體霸凌及網路霸凌，均屬學校管教政策的重要內涵（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2012a）。此外，英國政府更在 Education Act 2011 法案中，針對校長及特定教師在搜索學生物品、刪除電子設備中不當檔案（含手機）及停學處分等措施上，賦予更廣泛強制之管教權力，以因應校園霸凌等重大偏差行為。

雖然，近年來英、美兩國均出現對學校執行零容忍政策過於嚴苛及缺乏彈性之批評（Schwartz & Rieser, 2001; Rosen, 2005），但多數地方政府及學校管理者仍主張，反霸凌政策的一致性與堅定執行，對減少校園霸凌及維護校園安全有其必要性（Essex, 2012）。

三、行政法之原則

雖然英美中小學對校園霸凌等偏差行為之懲戒，擁有相當裁量權力，但為兼顧保障基本人權及校園安全，英、美兩國教育法體系（包含普通法及制定法）對學生偏差行為懲戒措施相關事項，仍依循行政法之重要原則予以規範，其主要意旨如下（Department for Children, Schools and Families, 2007a; Ford et al., 2010; Leyland & Anthony, 2013; Thomas et al., 2009）。

（一）法律保留原則（principle of legality）

又稱為「合法性原則」，係法治之基礎，其要求政府所作任何侵犯人民財產或自由之行為，均需有國會通過之法律來證明確屬合法，亦即

政府必須提供其行為之嚴格法律依據（陳新民，2001：71）。此一原則在英國主要係以下列內涵呈現¹⁰：

1. 越權原則（*ultra vires*）：意指公共部門應在權限範圍內作為，不得逾越制定法所規定之職權或濫用權力。若公共部門之作為（含委任立法）違反此一原則，構成不合法（*illegality*）狀況，法院即可介入審查並予以糾正。¹¹
2. 不得侵犯國際公約保障之基本人權：基於1998年《人權法》之通過，該法第6條第1項規定：任何公共機構侵害《歐洲人權公約》保障權利之作為，均屬違法。故《歐洲人權公約》有關人身自由及安全（第5條）、罪刑法定（*no punishment without law*）（第7條）、尊重隱私、家庭及通訊自由（第8條）、受教權（議定書第2條）等條文，已成為制定法中對公共部門不得非法限制或侵犯人民基本權利之規範，具體呈現法律保留之要求，且公立學校亦需遵守。¹²

至於美國因聯邦憲法第1條明定立法權屬於國會，聯邦最高法院由此發展出「禁止授權原則」（*nondelegation doctrine*），認定國會不得將立法權交由行政機關行使。¹³惟基於授權行政立法之必要性，實務上此一原則並未嚴格適用。而在基本人權保障上，美國公共部門主要係依

¹⁰ 法律保留原則係法治國家立法權與行政權關係之基本原則，亦為法治國之基本原則，且無論此一原則在憲法上有無明文規定，現代法治國家幾無例外均予以遵循，但對於法律保留之內涵則各有其不同制度（吳庚，2003；志華、趙達瑜、劉華美，2010）。

¹¹ 參見 *Council of Civil Service Unions v. Minister for the Civil Service* [1985] AC 374. (GCHQ)。

¹² 以英國教育部針對中小學學生退學（*exclusion*）之行政命令規定為例，其即明確要求學校所有對偏差行為學生的懲戒措施（包含退學），必須符合行政法之原則，諸如合法性原則（包括遵守《歐洲人權公約》）、合理（*reasonable*）原則及比例原則（參見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2012c）。

¹³ 參見 *Field v. Clark*, 143 U.S. 649(1892)。

循聯邦憲法各條修正案之規範，特別是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Fourteenth Amendment**），明定各州不得未經正當法律程序，剝奪任何公民生命、自由和財產權。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透過判例將此一修正案與其他修正案保障之權利結合，¹⁴ 同時從實質與程序之正當性來防止政府部門侵害公民基本人權。因此，美國各州及學區除有法律依據或授權，其訂定之管教法規及懲戒措施，均不得損害學生受憲法保障之基本權利（**regulations should not impair constitutionally protected rights**）。

（二）平等原則（**principle of equality**）

除非有合理差別對待之理由（例如身心障礙因素），否則對學生偏差行為之懲戒，必須公平一致，不得有基於家庭、宗教、地域、學業成績等因素之差別待遇。

（三）法律明確性原則（**principle of legal certainty**）

此係依法行政原則之主要成分，要求法規範之構成要件及法律效果能夠明白清楚，若是授權行政機關訂定命令，則授權之目的、內容及範圍應具體明確（李惠宗，2007）。英國亦從法治（**rule of law**）概念中發展出此一原則，認為政府部門處理公共事務應有確定性及可預測性（De Smith, Woolf, Jowell, & Le Sueur, 1999），以保障人民對其權益之合法期待（**legitimate expectation**）。因此，英國教育部要求學校在訂定學生行為政策（**behavior policy**）時，必須明確並使師生、家長周知（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2013）。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亦透過判決表示：規範人民義務之制定法必須明確清晰（**definite and clear**），不需猜測其意義及適用方式，否則即違反憲法對一般正當程序之要求

¹⁴ 參見 *Cantwell v. Connecticut*, 310 U.S. 296,303(1940)；*Gitlow v. New York*, 268 U.S. 652,666(1925)。

導致無效，¹⁵ 此即「模糊無效原則」(void for vagueness doctrine)。所以，美國各州及學區訂定之學生管教法規及懲戒措施，普遍要求具體(specific)明瞭，以使學生與家長能夠理解何種行為係違反法規，如規範內容過於簡略或空白授權教職員認定，即有可能在司法訴訟時遭到法院判決無效。¹⁶

(四) 比例原則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即學生懲戒應採取對基本人權侵害最小之方式，並確保懲戒措施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之目標利益失去均衡；換言之，懲戒措施應與違法行為責任相當(punishments should be appropriate to the offense)。如懲戒措施涉及學生權利之限制或剝奪時，除就其行為類型及造成傷程度考量外，亦應考慮學生的年齡、性別、心理狀態與過去行為紀錄。

(五) 正當法律程序 (due process of law)

主要內涵為當事人應受到公平司法程序保障，有權陳述本身意見或提出證據，調查證據時有親自或請代理人到場辯論之權利，同時，在調查或審判過程，應有合理準備期間，不得受到縮減。凡對學生施以懲戒處分，均應給予學生及其家長申訴及調查程序上之保障；且愈是剝奪或限制學生權利愈大之懲戒處分(如停學、退學)，其執行及救濟程序即應愈完整。以英國學生永久停學(退學)處分為例，係由 LEA 處理家長對永久停學之書面上訴，LEA 應設置獨立上訴委員會(Independent Appeal Panels)處理家長對永久停學之上訴，家長之上訴應於指定期限內，以書面向 LEA 提出。美國聯邦及州法院判決也明確表示：依學生所受懲戒處分的嚴重程度，提供學生之正當法律程序的質與量，亦需有所調整對應。同時，任何懲戒處分都應伴隨特定程序，以避免學區管理

¹⁵ 參見 *Connally v. General Construction Co.*, 269 U.S. 385, 391 (1926)。

¹⁶ 參見 *Killion v. Franklin Reg'l Sch. Dist.*, 136 F. Supp. 2d 446, 459 (W. D. Pa. 2001)。

者在正當法律程序上出現錯誤。如果學生認定遭到不當停學或開除，有權要求恢復原狀，學校不得因此扣減學生成績，且學校管理者應刪除學生個人紀錄中有關此一不當處分之資訊。¹⁷

四、利害關係人義務

（一）主管行政機關

英國之 LEA 及中小學依法對校園霸凌等學生偏差行為之後果負有法律責任，且自 2012 年起，英國教育部已將防制校園霸凌列入英國教育標準局（Office for standards in education, Ofsted）「學生行為及學校安全」年度視導項目之範圍，所有中小學均需接受視導（Ofsted, 2012a）。此外，LEA 依法應建置「行為與教育支援小組」（behavior and education support teams, BESTs），以支援協助所屬學校執行學生行為改善方案，¹⁸ 其主要係以國民中小學之學生為服務對象，並採取多部門（multi-agency）之任務團隊提供學校各項協助，亦即整合地方政府各部門之相關工作，對有偏差行為、適應困難之學生及其家長，給予醫療、諮商、社會福利等服務（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Skills, 2008）。

而依美國聯邦政府部門之調查分析（HHS, 2012a; Stuart-Cassel et al., 2011），至 2012 年底，全美 50 州僅蒙大拿（Montana）州尚未制定防制霸凌法律；而在已有反霸凌專法之 49 州中，有 39 州同時建立防制網路霸凌之規範；同時，各州法律中多數已要求學區通報校園霸凌事件（37 州）、調查通報事件及啟動保護受害者程序（32 州）、明確規範霸凌行為者面對之後果（consequences）與懲戒措施（44 州），以及對

¹⁷ 參見 *Pervis v. LaMarque Indep. Dist.*, 466 F. 2d 1054, 1057(5th Cir. 1972); *McEntire v. Brevard County Sch. Bd.*, 471 So. 2d 1287 (Fla. Civ. App. 1985); *Ruef v. Jordan*, 605 N. Y. S. 2d 530 (App. Div. 1993)。

¹⁸ 英國教育法令（如 section 9 of Education Act 1997），要求所有 LEA 建立完整行為支援服務，除採取 BESTs 運作模式外，亦包含設置替代教育機制。

學校教職員提供處理霸凌事件之教育訓練並發展提供全校性或社區性預防方案（40州）。此外，亦有24州之法令或學區政策提供校園霸凌之受害者及加害者等進行諮商、輔導及醫療等服務。

（二）學校教育人員

依英國學校標準架構法（SSFA）第61條之規定，中小學校管會必須依法制訂學生偏差行為之管教政策。此外，英國教育部也透過行政命令賦予校長執行學生行為管理政策並決定獎懲措施之責任，特別是激勵學生正向行為且預防任何形式之霸凌發生，並要求校長至少每年應對教職員、家長及學生公布宣達學校之行為管教規章（書面及網路）（Department for Children, Schools and Families, 2007a）。而英國中小學教師依據「教師待遇及工作條件法案」之規定（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Skills, 2006），其專業責任除教學輔導外，亦包含管教學生及維持教學活動之紀律，因此，協助處理校園霸凌事件也屬於學校教師專業工作的一部分。

至於美國各州法律均明確授權州及所屬機構與地方學區，基於保護學生權益及建立有益學習之校園環境，有權訂定並執行合理的學生行為規範；同時，由於校園安全長期以來即係家長對學校教育服務的優先關注目標，因此，學校教職員有法律及道德之義務維持學生行為之紀律，即使相關懲戒規範可能損及學生受法律保障之自由權，只要被證明具有合法教育利益之正當性，仍會受到司法部門的支持（Imber et al., 2010; Thomas et al., 2009）。事實上，為強化學校教職員管教權力，建構有秩序的學習環境，在2001年生效的聯邦「無一學童落後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中，亦包含《教師保護法案》（Teacher Protection Act）條文，其適用對象包括獲得聯邦補助款之州所屬學區的全體教職員。此一法案提供學校教職員（教師、校長及其他專業人員）因維持學生秩序採取合理行動時所需之保障，亦即在教職員權限內因

維持校園紀律而懲戒學生，只要未有違法之不當行為，即便使用強制力（包括體罰）亦得豁免相關法律責任。¹⁹ 同時，學生及家長向聯邦法院提出有關學校教職員之管教爭議告訴，若與事實不符且敗訴，則原告需負責被告辯護所需之訴訟費用（包含聘請律師支出）（謝慧游，2007）。

（三）學生家長

依據英國 1996 年教育法之規定，家長對其子女在校之偏差行為負有協助改善之義務，若其子女之行為無法改善，則 LEA 或學校得依下列方式要求家長負起連帶責任（Department for Children, Schools and Families, 2007c）：

1. 學生遭停學處分：如學生因霸凌等偏差行為被永久停學或在一年內被定期停學二次以上時，LEA 或學校得向法院申請對其家長發出「教養令」（parenting order），此一教養令通常包含兩個部分：
 - (1) 要求家長出席諮商、輔導課程（上限三個月）。
 - (2) 配合學校之特定要求以改善學生行為（最多一年）。

其中有關課程等額外經費由 LEA 支付，而家長違反教養令者，學校可移送治安法院（Magistrates' Courts）裁決處以罰金（每次最高一千英鎊）。

2. 學生違反「反社會行為令」（anti-social behavior order）：所謂反社會行為（anti-social behavior）包括任何造成他人生活品質之毀損、混亂的威嚇性、挑釁性或破壞性之行為。以學生而言（10 至 17 歲），在教室不聽制止嘶吼、損壞公物、製造噪音、威脅

¹⁹ 教職員遭控告事由若為個人疏失造成學生在管教措施以外之傷害，則教師保護法不提供保護。同時若能證明教師在管教學生時使用過當強制力（excessive force），法院依然得判決教師侵害學生權利。參見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Act（ESEA）as amended by No Child Left Behind: Title II, Part C, Subpart 5。另美國至 2008 年止，仍有 19 州法律允許學校教職員體罰學生（Center for Effective Discipline, 2010）。

使用暴力等，均可能被視為反社會行為，進而遭法院發出反社會行為令禁止其再出現類似行為。若學生違反此一命令，則法院亦可連帶對其家長發出「教養令」，藉以要求家長共同負起改善學生偏差行為之責任（林斌，2013）。

而以美國加州相關法令規範為例，加州所屬學區學生之家長，若其子女在校出現騷擾學校教育活動、蔑視教職員權力、霸凌同儕等不當行為，並因此遭到停學處分時，學區得要求家長列席學生上課日之部分課程（E.C.48900.1, 48904）。此外，加州教育法亦規定：學生在一學年中曠課三次以上時，將被視為習慣性曠課，其家長會收到通知書（E.C.48262），而家長負有強制將子女送至學校接受教育之義務，若其子女曠課未能改善，家長將逐次受罰，最高可被處以罰款500美元（此一罰款得以接受家長輔導課程取代）（E.C.48260, 48261, 48293）。值得注意的是：若學齡子女具有身心障礙或家庭經濟弱勢等特殊因素，其家長之義務將得到豁免或彈性調整。惟因學校或地方教育主管機關已提供遭停學學生替代教育之服務，所以，家長將子女送至學校接受義務教育之責任，並不限於主流學校，亦包含替代學校或替代教育方案，如此方能確保學生不致在停學期間在外遊蕩，錯失輔導與學習之機會。

五、校外機構參與

由於提供義務教育服務係英、美地方政府的法定責任，因此，如有學生因校園霸凌行為遭受停學或退學處分時，除給予專業輔導外，政府部門亦需依法提供相當程度之替代教育服務，且此一服務並不限於由公共部門提供。以英國為例，依1996年《教育法》（Education Act 1996）之規定，LEA 必須提供符合資格之學齡兒童全時義務教育，因此，針對因霸凌等偏差行為而遭停學之學生，自其停學第六天起，LEA 應提供適當之「替代教育服務」（alternative provision），使學生能有機會繼續接

受義務教育核心課程，以及社會互動技巧、職業技能、情緒管理等多元化個別教育計畫，惟此類替代教育服務，亦可由非政府部門提供（需經政府認可）（林斌，2013）。目前英國約有半數有此需求之學生，係由 LEA 設置之「轉介學校」（Pupil Referral Units, PRU）提供服務，此一替代教育學校亦為法定學校類型之一，且 LEA 設置、改變、關閉 PRU 都必須向教育部提出報告，同時，所有 PRU 與主流學校一樣配置專任教師及支援教學人員（Department for Children, Schools and Families, 2007b）。以 2012 年為例，英國共設置 403 所 PRU，提供 13,495 位學生服務，至於其他近半數進入替代教育的學生，係由 PRU 以外的非營利部門、企業、社區組織等外部機構提供服務（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2012b）。

而美國聯邦政府依憲法第十修正案規定，其職權並不包括中小學教育，相關教育事務係各州「保留權力」（reserved power）之一。因此，各州中小學教育體制均由該州法律決定，並對學齡兒童及青少年負有提供全時義務教育之責任。此外，全美 50 州中，已有 48 州制定不同形式及內涵之替代教育相關法令，以使未能於一般公立學校接受義務教育之學生，能享有相當程度之替代教育服務；同時，有 33 州在法律或政策中對替代學校課程予以規範，要求其課程應包含核心課程或州訂定之課程標準，而由外部機構（非營利組織、企業等）辦理之替代教育學校或方案，則需取得主管機關之許可（Martin & Brand, 2006）。依美國聯邦政府之統計，至 2007-2008 年度，全美有 75% 之地方學區，已由學區所屬單位或外部機構（非營利組織、企業等）提供替代教育學校或方案之服務（已有外部機構提供替代教育服務之學區達 35%），內容包括行為改善、品德教育、技藝學習等多元化個別教學計畫，共有 645,500 名學生註冊就讀（Carver & Lewis, 2010）。²⁰以紐約市為例，其依聯邦法、州法及學區政策，校長得對違反規定學生予以最多停學 5 天之處分，

²⁰ 美國各州除州法或個別學區政策規定需提供替代教育服務外，學區並無義務為經合法程序退學之學生提供替代教育（參見 Gun-Free Schools Act, 20 U. S. C. § 7151, 2007）。

而學區教育總監（superintendent）可對發生持有槍械、嚴重校園霸凌等行為之學生，處以最高一年之停學處分。惟不論停學處分時間長短，學校及學區均需同步安排被停學學生之替代教育服務。此一服務可以學生原校提供之「替代教育方案」（alternative program）或至學區設置之「替代學校」兩種方式之一實施。以後者而言，2012 年度紐約市所屬 5 個行政區下，共設立 38 所「替代學習中心」（alternative learning centers），同時提供學生法令規定之核心課程及適合其偏差行為狀況之輔導計畫，每一行政區設一位行政主管，每一學習中心置督導 1 人，課程教師 4 人及其他特殊教育教師、諮商員、支援性專業人員及學校助理人員（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13）。

六、英、美校園霸凌防制政策成效

（一）兩國內部調查統計

受限於調查工具、霸凌行為界定及法令規範通報內容之差異，英、美兩國校園霸凌事件之統計數據難以直接比較。以英國而言，由於中央法令並未要求學校將所有校園霸凌事件通報校管會，通報格式、內容亦無統一規定，且校園霸凌調查統計單位並未單一化，各單位調查期程、調查學生年齡範圍及問卷題目並不一致，所以，各單位調查結果通常均有所差別（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2012b; Ofsted, 2012b）。依英國 2009-2010 年度犯罪調查摘要顯示：22% 的 10 至 15 歲學齡兒童，曾在過去一年中遭受霸凌（Hoare, Parfremment-Hopkins, Britton, Hall, Scribbins, & Flatley, 2011），而同一年度由教育主管機關委託進行的另一項定期調查結果指出：有 26% 的 10 至 15 歲學齡兒童在過去一年在學校遭受霸凌（Chamberlain, George, Golden, Walker, & Benton, 2010），兩者存在差異之主因在於調查範圍及是否區分遭受霸凌地點（校內或校外）。不過，英國中小學校長對校園霸凌加害者處以課後留

校 (detention) 或停學等懲戒處分，必須列入通報統計，且即使是義務教育階段之學生，亦可能遭到永久停學 (permanent exclusion) (退學) 處分。而近年來英國公立中小學學生因校園霸凌遭到永久停學處分之人數，大致呈現下降之趨勢 (如表 1)。

而美國各地方學區中小學校園霸凌事件之調查，係採取學生問卷調查及學校通報兩種途徑同時進行。自 2003 年起，校園肢體霸凌發生率有減少之趨勢 (Essex, 2012: 106)；但是，從美國聯邦部門進行之統計調查結果來看，公立中小學整體校園霸凌發生率自 2005 年迄今，不論從學校或學生之填報資料觀察，並無明顯變化 (如表 2)。

表 1 英國公立中小學學生因霸凌遭永久停學處分人數 (2006-2011)

	2006-07 年	2007-08 年	2008-09 年	2009-10 年	2010-11 年
國小	10 (560)	10 (460)	0 (400)	0 (410)	0 (360)
國中	80 (5,710)	80 (4,870)	50 (4,400)	50 (4,310)	50 (4,120)
合計	90 (6,270)	90 (5,330)	50 (4,800)	50 (4,720)	50 (4,480)

資料來源：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2012d)。
註：括弧內為定期停學人數。

表 2 美國公立中小學暨學生 (12 歲 -18 歲) 通報霸凌事件之統計摘要 (2005-2010)

	2005-06 年	2007-08 年	2009-10 年
過去一年內曾遭受霸凌學生比例	28%	32%	28%
霸凌事件佔學校通報管教問題之比例	24.5%	25.3%	23.1%

資料來源：Robers、Zhang、Truman 與 Snyder (2010, 2012)。

(二) 國際調查統計

由於校園霸凌對學生身心均有負面影響，且為各國普遍存在之問題。故世界衛生組織 (WHO) 定期實施之「學齡兒童健康行為國際研究」 (Health Behaviour in School-aged Children Study)，亦包含對各國

校園霸凌現況之調查。其中英、美兩國 11 歲及 15 歲學生在過去兩個月內遭受霸凌兩次以上之比例，在 2004 年至 2012 年的三次調查結果中，前者（11 歲）發生率雖略有起伏，但後者（15 歲）明顯呈現下降趨勢並低於參與調查國家發生率之平均值（如表 3）。

表 3 美、英兩國中小學學生遭受校園霸凌比例之調查結果摘要（2004-2012）

過去兩個月內遭受霸凌兩次以上學生之百分比	美國		英國	
	11 歲	15 歲	11 歲	15 歲
2004 年	12.85	9.85	14.7	9.25
2008 年	16.5	7.5	10	8.5
2012 年	14	6.5	11	8
2012 年調查結果平均值（38 國及地區）	13	9	13	9

資料來源：Currie 等人（2012）。

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綜合而言，從教育法的觀點探討分析英、美兩國校園霸凌防制政策，其共通之特色及差異可分述如下：

（一）遵守行政法之原則

英、美兩國之校園霸凌防制政策，雖然重視偏差行為之後果及矯正，但亦十分注重懲戒措施之比例原則及正當法律程序。特別是在停學、退學等重大懲戒處分實施過程中，一方面重視法律保留、法律明確性等原則，賦予學校教育人員合理懲戒權，以維護校園學習秩序；但另一方面也遵守法律正當程序，保障學生及家長之救濟權利，保障相關基本人權。

（二）政策設計回應校園安全之需求

英、美兩國在防制校園霸凌政策發展上，均以政府制定法律為準

繩，透過合法授權及充分行政指導，使學校教育人員在政策執行上，既能堅定處理學生霸凌行為，亦能保有個案裁量彈性。同時，政策內容以法令為核心，輔以各類行政方案及輔導諮商服務，更普遍建立校園反霸凌宣導及調查通報機制，整體政策設計有效回應校園安全之需求。

（三）深化利害關係人課責

傳統上處理校園霸凌是學校及政府的責任，家長往往扮演子女權益代理者的被動角色。但是，在英、美防制校園霸凌政策中，除對學校教職員賦予法定義務外，更已逐漸透過法定政策工具，要求家長負起共同改善學生行為之責任，反映出校園霸凌防制需要家長積極投入的政策趨勢。同時，主管機關除了過去提供學校資源及訂定法令政策之功能外，也必須提供完整周延的替代教育服務，從行為輔導及核心課程雙管齊下，保障學生接受義務教育之權利。

不過，雖然英、美防制校園霸凌政策，均反映出深化利害關係人課責之發展方向，但是，英國透過制定法統一規範主管機關提供學生替代教育之完整程序，以及針對未能善盡改善子女偏差行為義務之家長課以罰金的作為，明顯在介入校園霸凌加害者之家庭教養責任上，較美國更為強勢積極。

（四）輔導與懲戒並行不悖

學生出現校園霸凌行為，往往並非來自單一因素，且不同個案間之差異甚大。因此，學校教職員需要有多元化的輔導方案及懲戒措施，才能因應不同狀況，降低校園霸凌的發生率。所以，英、美學校及地方主管機關，不僅建置常態性行為改善支援團隊及輔導機制，更透過課後留校、停學等懲戒措施之執行，以達到兼顧學習品質及校園安全之政策目標。換言之，雖然引發校園霸凌的原因未必全然歸責於加害者，學校處理學生霸凌行為亦不以懲處為重心，但是，基於維護校園安全的優先考

量，對於霸凌加害者仍應依法規予以適度懲戒，以建立校園學習的合理秩序，減少校園霸凌事件之發生。

（五）引進校外機構提供替代教育服務

英、美校園霸凌防制政策已揚棄政府係公共服務唯一提供者的思維，開放非政府之校外機構提供替代教育服務。此種公私協力的教育服務模式，不僅可以讓替代教育實施更具彈性，也能提供家長在課程與輔導計畫上的多元選擇。同時，非政府部門的替代教育提供者，形同公立學校改善學生偏差行為上的治理夥伴，可使公共教育資源之配置更具效能。尤其，英國統一規範地方主管機關設置公立替代教育學校，將其視為法定學校類型並依法配置教職員，使其成為義務教育之常態編制，此種政策設計相較於美國現有多元且無齊一標準之替代教育模式而言，展現出對改善學生偏差行為及保障義務教育品質的不同思維。

（六）防制政策呈現正面成效

雖然英、美兩國近年學生遭受校園霸凌比例，從其本國調查統計來看，平均仍在兩成以上，不過，由於調查對象及調查工具之差異，統計結果並不適合直接進行跨國比較，若以兩國統計數據自我比較而言，校園霸凌發生率並無惡化趨勢。同時，從世界衛生組織實施之國際性調查研究結果觀察，英、美兩國 11 歲學生之霸凌受害者比例雖互有增減，但在 15 歲學生遭受校園霸凌之比例係呈現明確減少趨勢，代表從義務教育階段之整體觀點而言，學生遭受霸凌比例隨年齡增長而下降，故英、美兩國校園霸凌防制政策應可視為具有正向成效。

二、建議

（一）改善我國學校管教學生之法制

相較於英、美兩國現行教育法體系，我國法律並未明確直接賦予

學校教師懲戒學生之權力，且中小學校務會議依《教師法》第 17 條第 2 項訂定之「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並非法規命令，僅係公立學校作為營造物機關訂定規範教師履行輔導管教學生義務之行政規則，若教師或學校學生獎懲委員會之管教措施涉及剝奪或限制學生權利時，即可能因不符法律保留原則之要求，而難以對學生或家長產生拘束力（周志宏，2007）。即便是教育部訂定之「校園霸凌防制準則」，具有法規命令效力，但因母法（教育基本法第八條第五項）授權內容及範圍均不明確，故此一準則在學生懲戒措施上亦無任何強制性規範。所以，我國政府部門應致力改善學校管教學生之相關法制，使學校教育人員能積極適法處理校園霸凌等學生偏差行為，有效維護校園安全。

（二）強化我國家長改善子女在校偏差行為之義務

我國教育相關法律中，並無針對家長改善子女在校偏差行為義務之規範，明顯與英、美防制校園霸凌政策中，深化利害關係人課責之方向有別。此一現況亦造成我國學校無權要求家長配合對學生之管教措施，往往導致學生行為問題日趨惡化。故未來政府有必要在教育法律中增訂相關規範。

（三）建構替代教育機制

我國目前國民教育系統中，並無類似英、美兩國替代教育學校之機制，但此一機制不僅能增加學校安排學生行為輔導或懲戒措施之彈性，亦能提供家長在輔導方案及學習模式上的多元選擇，尤其可以引進民間資源投入改善學生偏差行為，實值得我國政府部門列入未來相關政策發展之努力目標。

致謝

本文係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NSC 101-2410-H-024 -005）之部分研究成果，較早版本發表於國立臺南大學 2013 教育高階論壇「數位時代之教育議題與發展」學術研討會（2013/05/10），特此感謝科技部之補助及匿名審查委員的寶貴意見。

School Anti-bullying Policies in the UK and USA: A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 Law

Summary

Introduction

Since 1970s, bullying in schools has become widely viewed as an urgent health and education concern that has moved to the forefront of public debate on educational legislations and policies in advanced countries (Stuart-Cassel, Bell, & Springer, 2011). Meanwhile, the governments of the UK and USA, two members of OECD, have passed special laws to regulate different types of bullying (Moore, Jones, & Broadbent, 2008).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examine the policy measures used to prevent bullying in schools in UK and USA, and implications of anti-bullying mechanisms for schools in Taiwan were proposed accordingly.

Method

In order to examine the roles, duties, rights and cooperation of stakeholders, such as bullies, victims, school staff,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s, parents and relative external groups, in the anti-bullying network in detail, the historical comparative method was adopted to figure out and explain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anti-bullying policies in the UK and USA. The data for this study was mainly drawn from secondary sources including books, laws, regulations, journals, government reports and guidelines, legislative papers and newspapers. Through document analysis and literature review, implications were extracted in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 law.

Results

First, even though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ystem of the UK and USA are different, both nations have corresponding laws and administrative guidance for local governments regarding anti-bullying policies. The laws clearly outlined the authority and power that the school's teaching staff holds in handling students' deviant behavior, including bullying; this is a significant characteristic of the two nations' anti-bullying policy.

Second, many local governments and school administrators in the UK and USA believed that strongly enforcing the zero tolerance policy toward bullying is essential in maintaining school safety. Although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both nations have the power to determine the disciplinary actions for deviant behaviors including bullying, the education laws (including common law and statutes) of the two nations complied with the important principles of the administrative laws to ensure basic human rights of students and the safety in schools (Ford, Hughes, & May, 2010; Leyland & Anthony, 2013; Thomas, Cambron-McCabe, & McCarthy, 2009).

Furthermore, stakeholders of schools in the UK and USA, including the teaching staff, parents, and local governments, all play a responsible role in preventing bullying in schools. In addition, alternative education provided by institutions other than the school should be ensured in terms of time and quality, and thus being able to offer another educational option for students, who are suspended due to bullying, outside the public school system.

Discussion and Conclu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 law, the anti-bullying policies of the UK and USA could be examined in the following six aspects:

(1) Complying with the principles of administrative law

On one hand, the principle of legality and principle of legal certainty must be taken into account to authorize the school's teaching staff so that they can take reasonable disciplinary actions to maintain the order in school. On the other hand, the due process of law must be respected to ensure the basic rights of the students and their parents.

(2) Designed to fulfill the requirement of school safety

The anti-bullying policies of the two nations were authorized by law so that school's teaching staff are guaranteed to handle bullying behavior firmly with a legal basis, and then a practical reporting mechanism could be established due to the uniformity between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As the result, a safe learning environment without bullying could be created.

(3) Introducing parents' accountability

In both nations' anti-bullying policies, parents are demanded to take a part of the responsibility for their child's behavior, reflecting the policy trend of involving parents in anti-bullying measures. However, the UK has established statutes to prosecute and fine parents who failed to improve their child's deviant behavior in school. Compared to the USA, the UK implemented a significantly stronger and more active stand requiring parents sharing responsibilities for their child's bullying behaviors.

(4) Supporting counseling and disciplinary action

Schools and local authorities in the UK and USA not only conducted the preventive measures, such as regularly supplying the counseling personnel and improving the anti-bullying mechanisms, but also enforced disciplinary actions including detention and suspension as the consequences of serious incidents, like bullying. Both preventive support and afterward consequences were indispensable to maintain the quality of learning and the safety in campus.

(5) Providing alternative education by institutions other than the school

The anti-bullying policies in the UK and USA have discarded the idea that the government is the only provider of the public educational service. The policies have made alternative education by institutions other than the school available so that the education system can be more flexible to accommodate diverse needs of students.

(6) The positive influence of the policies

The results of the Health Behavior in School-Aged Children Study conducted by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revealed that the number of 11-year-old bullying victims increased in the UK and decreased in the USA, but the number of 15-year-old bullying victims in both nation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Currie et al., 2012). This implied that the anti-bullying policies of the UK and USA had a positive effect, at least at the age of 15, which was the peak of laddish and deviant behaviors.

Implication

Therefore, compared to the current anti-bullying policies in the UK and USA,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should, to the best of its effort, improve the relevant laws so that the teaching staff in schools are able to handle deviant behaviors, such as bullying, more effectively with the confidence of legal back up. At the same time, rules regarding the parents' responsibilities for their child's deviant behaviors in school should be introduced to include the paramount role of parents in pupils' social development, and alternative education should be made available from sources other than the school to allow the flexibility in education system and to accommodate the diverse needs and status of youngsters.

參考文獻

- 王澤鑑（主編）（2010）。*英美法導論*。臺北市：元照。
[Wang, T.-C. (Ed.). (2010). *Introduction to Anglo-American law*. Taipei, Taiwan: Angle.]
- 江愛華、高家彬（2011）。全球化趨勢與臺灣中小學教育改革分析。載於國家教育研究院（編），*我國百年教育回顧與展望*（頁 81-104）。臺北市：國家教育研究院。
- [Chiang, A.-H., & Gao, J.-B. (2011). The global trend and the analysis on the reform of secondary and elementary education in Taiwan. In National Academy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Ed.), *A century of education in Taiwa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pp. 81-104). Taipei, Taiwan: National Academy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 吳定（1998）。*公共政策辭典*。臺北市：五南。
[Wu, D. (1998). *The dictionary of public policy*. Taipei, Taiwan: Wunan.]

- 吳庚（2003）。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臺北市：三民。
[Wu, G. (2003). *The administrative law: Theories and practices*. Taipei, Taiwan: San-Min.]
- 李惠宗（2004）。教育行政法要義。臺北市：元照。
[Lee, H.-T. (2004).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ve law*. Taipei, Taiwan: Angle.]
- 李惠宗（2007）。行政罰法之理論與案例。臺北市：元照。
[Lee, H.-T. (2007). *The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act: The theories and cases*. Taipei, Taiwan: Angle.]
- 沈姍姍（1995）。台灣的教育選拔制度與社會流動之探討。新竹師院學報，
8，95-113。
[Shen, S.-S. (1995). Educational selection system and social mobility in Taiwan. *Journal of National Hsin Chu Teachers College*, 8, 95-113.]
- 周志宏（2007）。學生管教法制之再檢討。國民教育，47（4），4-14。
[Chou, C.-H. (2007). Reconsider the legal framework of student discipline. *Elementary Education*, 47(4), 4-14.]
- 周志宏、徐筱菁、薛曉華、蔡志偉（2008）。教育法體系基礎概念之研究。
教育部委託專案報告。新北市：淡江大學教育政策與領導研究所。
[Chou, C.-H., Hsu, C.-C., Hsueh, H.-H., & Tsai, C.-W. (2008). *The study of basic conceptions on educational law system*. Ministry of Education funded report. Taipei, Taiwan: Tamkang University.]
- 林斌（2006）。中英學生管教制度之比較研究——教育法學的觀點。教育
研究集刊，52（4），107-139。
[Lin, B. (2006). The student disciplinary system in the U.K. and Taiwan: A comparative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al law.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52(4), 107-139.]
- 林斌（2013）。英國防治校園霸凌法制之研究：教育治理之觀點。教育經
營與管理研究集刊，9，1-29。
[Lin, B. (2013). The study of legal system for preventing school bullying in Engl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 governance.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nd Management*, 9, 1-29.]

張文貞（2007）。跨國憲政主義的合縱與連橫——歐洲人權法院及內國憲法法院關係初探。《月旦法學》，151，57-70。

[Chang, W.-C. (2007).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national constitutionalism: The study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and constitutional court. *The Taiwan Law Review*, 151, 57-70.]

許育典（2007）。《教育法》。臺北市：五南。

[Hsu, Y.-D. (2007). *Bildungsrecht*. Taipei, Taiwan: Wunan.]

許宗力（2006）。論法律保留原則。載於許宗力（編），《法與國家權力（一）》（頁117-213）。臺北市：元照。

[Hsu, T.-L. (2006). The principle of legality. In T.-L. Hsu (Ed.), *Law, state and power (I)* (pp. 117-213). Taipei, Taiwan: Angle.]

陳利銘、鄭英耀、黃正鵠（2010）。反霸凌政策之分析與改進建議。《教育政策論壇》，13（3），1-25。

[Chen, L.-M., Cheng, Y.-Y., & Hwang, C.-K. (2010). Analyzing anti-bullying policies in Taiwan. *Educational Policy Forum*, 13(3), 1-25.]

陳志華、趙達瑜、劉華美（編）（2010）。《行政法基本理論（修訂三版）》。新北市：國立空中大學。

[Chen, C.-H., Chao, D.-Y., & Liou, H.-M. (Eds.). (2010). *Foundational theories of the administration law* (Rev. 3rd ed.). New Taipei City, Taiwan: The National Open University.]

陳淳文（2012）。行政保留之比較研究——以半總統制之行政命令權為中心。《中研院法學期刊》，10，1-80。

[Chen, C.-W. (2012). Administrative reserva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dministrative regulatory power under the semi-presidentialism. *Academia Sinica Law Journal*, 10, 1-80.]

陳新民（2001）。《法治國家論》。臺北市：學林文化。

[Chen, S.-M. (2001). *The rule of law nation*. Taipei, Taiwan: Sharing.]

黃舒芃（2004）。法律保留原則在德國法秩序下的意涵與特徵。《中原財經法學》，13，1-45。

[Hwang, S.-P. (2004). The principle of “Vorbehalt des Gesetzes” in context of the German legal tradition. *Chung Yuan Financial & Economic Law Review*, 13, 1-45.]

黃德祥、黃麗萍 (2009)。美國各州反欺凌立法及政策分析。教育研究月刊，**183**，137-149。

[Huang, D.-H., & Huang, L.-P. (2009). The analysis of anti-bullying laws and policies in U.S.A. *Journal of Education Research*, 183, 137-149.]

謝哲勝 (2002)。英美法和大陸法的融合。國立中正大學法學集刊，**6**，33-64。

[Hsieh, J.-S. (2002). The confluence of Common Law and Civil Law. *National Chung Chen University Law Journal*, 6, 33-64.]

謝慧游 (2007)。美國有關校園體罰與小學班級管教實務之研究。出國研究報告。2012年10月25日。取自 http://210.241.21.164/ReportFront/report_download.jsp?sysId=C09600295&fileNo=001

[Hsieh, H.-Y. (2007). *The study of corporal punishment and discipline for elementary school classroom in U.S.A.* Research report. Retrieved October 25, 2012, from http://210.241.21.164/ReportFront/report_download.jsp?sysId=C09600295&fileNo=001]

Babbie, E. R. (2012). *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earch* (13th ed.). Belmont, CA: Wadsworth Cengage Learning.

Blandford, S. (1998). *Managing discipline in schools*. London, UK: Routledge.

Carver, P. R., & Lewis, L. (2010). *Alternative schools and programs for public school students at risk of educational failure: 2007-08* (NCES 2010-026).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Center for Effective Discipline. (2010). *U.S.: Corporal punishment and paddling statistics by state and race*. Retrieved February 25, 2013, from <http://www.stophitting.com/index.php?page=statesbanning>

Chamberlain, T., George, N., Golden, S., Walker, F., & Benton, T. (2010). *Tellus4 national report* (DCSF-RR218). London, UK: Department for Children, Schools and Families.

Conn, K. (2004). *Bullying and harassment: A legal guide for educators*. Alexandria, VA: ASCD.

Currie, C., Zanotti, C., Morgan, A., Currie, D., de Looze, M., Roberts, C., et al. (Eds.). (2012).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and well-being among young people. Health behaviour in school-aged children (HBSC) study: International report from the 2009/2010 survey*. Copenhagen, Denmark: WHO Regional Office for Europe.

- De Smith, S. A., Woolf, H., Sir., Jowell, J. L., & Le Sueur, A. P. (1999). *De Smith, Woolf, and Jowell's principles of judicial review*. London, UK: Sweet & Maxwell.
- Department for Children, Schools and Families. (2007a). *School discipline and pupil behaviour policies: Guidance for schools* (00050-2010DOM-EN). Nottingham, UK: Author. Retrieved December 19, 2011, from <http://www.teachernet.gov.uk/docbank>
- Department for Children, Schools and Families. (2007b). *Providing full-time education from the sixth day of any fixed period exclusion: Implementation and good practice guidance for schools, including PRUs*. London, UK: Author.
- Department for Children, Schools and Families. (2007c). *Providing full-time education from day six of a permanent exclusion: Implementation and good practice guidance for local authorities*. London, UK: Author.
- Department for Children, Schools and Families. (2009). *School discipline and pupil-behaviour policies: Guidance for schools*. Retrieved December 20, 2012, from <http://www.dcsf.gov.uk/everychildmatters/earlyyears/>
-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2011). *Preventing and tackling bullying: Advice for head teachers, staff and governing bodies* (DFE-00062-2011). London, UK: Author.
-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2012a). *Preventing and tackling bullying: Advice for head teachers, staff and governing bodies*. London, UK: Author.
-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2012b). *Pupil behaviour in schools in England* (DFE-RR218). London, UK: Author.
-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2012c). *Statutory guidance and regulations on exclusion: The head teacher's power to exclude* (DFE-57501-2012). London, UK: Author. Retrieved July 25, 2013, from <http://www.education.gov.uk/aboutdfe/statutory/g00210521/statutory-guidance-regs-2012/guidance/heads-power-to-exclude>
-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2012d). *Permanent and fixed-period exclusions from schools in England: academic year 2010 to 2011* (SFR17/2012). London, UK: Author. Retrieved August 21, 2013, from <http://www.education.gov.uk/rsgateway/DB/SFR/s001080/index.shtml>
-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2013). *Behaviour and discipline in schools: A guide for head teachers and school staff* (DFE-00023-2014). London, UK: Author. Retrieved August 18, 2013, from <http://education.gov.uk/aboutdfe/>

advice/f0076803/guide-for-heads-and-school-staff-on-behaviour-and-discipline

-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Skills. (2006). *School teachers' pay and condition document 2006 & guidance on school teachers' pay and conditions*. London, UK: TSO.
-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Skills. (2008). *Behavior and education support teams 2008*. Retrieved September 12, 2011, from http://www.dfes.gov.uk/best/about_BEST/index.cfm
- Duncan, R. C. (2011). Family relationships of bullies and victims. In D. L. Espelage & S. M. Swearer (Eds.), *Bullying in North American schools* (2nd ed., pp. 191-204). New York: Routledge.
- Essex, N. L. (2012). *School law and the public schools: A practical guide for educational leaders* (5th ed.). Boston, MA: Pearson.
- Ford, J., Hughes, M., & May, K. (2010). *Education law and practice* (3rd ed.). Bristol, UK: Jordans.
- Gastic, B. (2008). School truancy and the disciplinary problems of bullying victims. *Educational Review*, 60, 391-404.
- Haselgrove-Spurin, C. (2004). *Constitut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law (public law)* (2nd ed.). Pontypridd, UK: Nationwide Mediation Academy for NADR.
- Hoare, J., Parfremment-Hopkins, J., Britton, A., Hall, P., Scribbins, M., & Flatley, J. (Eds.). (2011). *Children's experience and attitudes towards the police, personal safety and public spaces: Findings from the 2009/10 British crime survey interviews with children aged 10 to 15*. London, UK: Home Office Responsible Statistician. Retrieved March 20, 2013, from 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116447/hosb0811.pdf
- Imber, M., & Van Geel, T. (2010). *Education law* (4th ed.). New York: Routledge.
- Jacobsen, K. E., & Bauman, S. (2007). Bullying in schools: School counselors' responses to three types of bullying incidents. *Professional School Counseling*, 11(1), 1-9.
- Jeffries, J., Jr. (1985). Legality, vaguenes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enal statutes. *Virginia Law Review*, 71, 189-246. Retrieved June 3, 2013, from http://www.law.virginia.edu/pdf/faculty/hein/jeffries/71va_1_rev189_1985.pdf

- Jimerson, S. R., Swearer, S. M., & Espelage, D. L. (2010). International scholarship advances science and practice addressing bullying in schools. In Authors (Eds.), *Handbook of bullying in schools: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pp. 1-6). New York: Routledge.
- Klomek, A. B., Marracco, F., Kleinman, M., Schonfeld, I. S., & Gould, M. S. (2007). Bullying, depression, and suicidality in adolescent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 Adolescent Psychiatry*, 46(1), 40-49.
- Leyland, P., & Anthony, G. (2013). *Textbook on administrative law* (7th ed.).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rtin, N., & Brand, B. (2006). *Federal, state, and local roles supporting alternative education*. Washington, DC: National Center on Education and the Economy.
- Moore, K., Jones, N., & Broadbent, E. (2008). *School violence in OECD countries*. Surrey, UK: Plan.
- 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13). *Alternate learning center*. Retrieved May 11, 2013, from <http://schools.nyc.gov/Offices/ALC/default.htm>
- O'Brennan, L. M., Bradshaw, C. P., & Sawyer, A. L. (2009). Examining developmental differences in the social-emotional problems among frequent bullies, victims, and bully/victims. *Psychology in the Schools*, 46(2), 100-115.
-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2012). *2011 Census: Population estimates for the United Kingdom*. Retrieved April 12, 2013, from http://www.ons.gov.uk/ons/dcp171778_292378.pdf
- Office for Standards in Education, Children's Service and Skills. (2012a). *The framework for school inspection*. Retrieved March 19, 2013, from <http://www.ofsted.gov.uk/resources/090019>
- Office for Standards in Education, Children's Service and Skills. (2012b). *No place for bullying: How schools create a positive culture and prevent and tackle bullying*. Retrieved March 19, 2013, from <http://www.ofsted.gov.uk/resources/110179>
- Office of the Children's Commissioner. (2006). *Bullying today: A report by the office of the children's commissioner, with recommendations and links to practitioner tools*. London, UK: Office of the Children's Commissioner.

- Olweus, D. (1993). *Bullying at school: What we know and what we can do*. Malden, MA: Blackwell.
- Olweus, D. (1997). Bully/victim problems in school: Facts and interven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of Education, 12*, 495-510.
- Olweus, D. (1999). Sweden. In P. K. Smith, Y. Morita, J. Junger-Tas, D. Olweus, R. Catalano, & P. Slee (Eds.), *The natural of school bullying: A cross national perspective* (pp. 7-27). London, UK: Routledge.
- Olweus, D. (2010). Understanding and researching bullying: Some critical issues. In S. R. Jimerson, S. M. Swearer, & D. L. Espelage (Eds.), *Handbook of bullying in schools: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pp.9-33). New York: Routledge.
- Pontzer, D. (2010). A theoretical test of bullying behavior: Parenting, personality, and the bully/victim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Family Violence, 25*, 259-273.
- Rivers, I., Potteat, V. P., Noret, N., & Ashurst, N. (2009). Observing bullying at school: The mental health implications of witness status. *School Psychology Quarterly, 24*, 211-223.
- Robers, S., Zhang, J., & Truman, J. (2010). *Indicators of school crime and safety: 2010* (NCES 2011-002/NCJ 230812).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 Robers, S., Zhang, J., & Truman, J. (2012). *Indicators of school crime and safety: 2011* (NCES 2012-002/NCJ 236021).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 Roland, E. (2002). Bullying,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suicidal thoughts. *Educational Research, 44*(1), 55-67.
- Rosen, L. (2005). *School discipline: Best practices for administration* (2nd ed.). Thousand Oaks, CA: Corwin Press.
- Rosenbloom, H. D., & Kravchuk, S. R. (2002). *Public administration: Understanding management, politics, and law in the public sector* (5th ed.). New York: McGraw-Hill.
- Sacco, D. T., Silbaugh, K., Corredor, F., Casey, J., & Doherty, D. (2012). *An overview of state anti-bullying legislation and other related laws*. Retrieved March 14, 2013, from http://cyber.law.harvard.edu/publications/2012/state_anti_bullying_legislation_overview

- Schwartz, R., & Rieser, L. (2001). Zero tolerance as mandatory sentencing. In W. Ayers, B. Dohrn, & R. Ayers (Eds.), *Zero tolerance: Resisting the drive for punishment in our schools: A handbook for parents, students, educators, and citizens* (pp. 126-135). New York: The New Press.
- Skiba, R., & Peterson, R. (1999). The Dark side of zero tolerance: Can punishment lead to safe schools? *Phi Delta Kappan*, 80, 372-376.
- Starling, G. (2011). *Managing the public sector* (9th ed.). Boston, MA: Thomson Wadsworth.
- Stewart, J., Jr., Hedge, D. M., & Lester, J. P. (2008). *Public policy: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3rd ed.). Boston, MA: Wadsworth Thomson Learning.
- Stuart-Cassel, V., Bell, A., & Springer, J. F. (2011). *Analysis of state bullying laws and policies*.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Planning, Evaluation and Policy Development,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 Sullivan, K. (2011). *The anti-bullying handbook* (2nd ed.). Los Angeles, CA: Sage.
- The Elton Report. (1989). *Discipline in schools*. London, UK: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 Thomas, S. B., Cambron-McCabe, N. H., & McCarthy, M. M. (2009). *Public school law: Teacher's and student's rights* (6th ed.). Boston, MA: Allyn and Bacon.
- Townley, A. J., & Schmieder-Ramirez, J. H. (2010). *School law: A California perspective* (4th ed.). Dubuque, IA: Kendall Hunt.
-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 Human Services. (2012a). *Policies & laws*. Retrieved November 12, 2012, from <http://www.stopbullying.gov/laws/index.html>
-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 Human Services. (2012b). *Bullying definition*. Retrieved November 12, 2012, from <http://www.stopbullying.gov/what-is-bullying/definition/index.html>

